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谭智方
2023年2月21日 星期二 22593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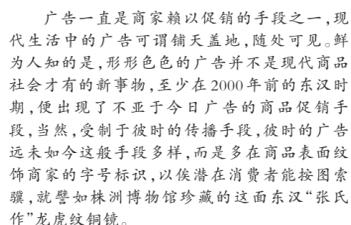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宝藏

『张氏作』龙虎纹铜镜,2000年前的形象广告

郭亮



▲前清举人黄昌峻的举人桅杆

广告一直是商家赖以促销的手段之一,现代生活中的广告可谓铺天盖地,随处可见。鲜为人知的是,形形色色的广告并不是现代商品社会才有的新事物,至少在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便出现了不亚于今日广告的商品促销手段,当然,受制于彼时的传播手段,彼时的广告远未如今这般多样,而是多在商品表面装饰商家的字号标识,以俟潜在消费者能按图索骥,就譬如株洲博物馆珍藏的这面东汉“张氏作”龙虎纹铜镜。

铜镜是在近代水银玻璃镜发明之前,古人最为常用的生活用品。大约在商朝中期,随着青铜器的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学会了用青铜打磨镜子,铜镜也便孕育而生。春秋时期,随着礼乐的盛行,人们开始重视礼仪,尤其是对自己衣冠的整洁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目的,铜镜也就成了贵族们梳妆台上的寻常之物,为了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尊贵,古代匠人还创造性地给予铜镜雕花刻字的装饰,同时也为生活增加了审美情趣。

时间到了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国力雄厚、经济繁荣,手工业获得很大的发展,铜镜之铸造也进入飞速发展时期。这时期的铜镜,制作精良,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社会公认的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而且,此时期的铜镜除了照面美容和审美需求之外,更增添了通灵辟邪、随葬镇墓、追求圆满之祈福功用,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时期的不少铜镜制造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所铸铜镜上纹饰自家的商号标识,可以视为2000年前的较为原始的广告之雏形。

即以株洲博物馆珍藏的这面东汉“张氏作”龙虎纹铜镜为例。该镜直径12.5厘米,重488克,背面中心为一个大型圆钮,圆钮周围采用高浮雕工艺,铸了一龙一虎环钮对峙,龙虎皆张口露齿,附近纹有卷云纹,纹饰生动,铸造精美,正是东汉时期最为常见的纹饰风格——龙虎图案,源于古代天文上的四象,古代占星术士以春分前后初昏的天象作为依据,把黄道附近的二十八宿星,划分为四个星座并想象成四种动物形象,《礼记·曲礼》中说:“行军之方位”“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用这四种旗帜,象征四神的威力,可以御四方,辟不祥,古人将它铸在铜镜上,用以镇宅辟邪之意,是东汉时期铜镜的杰出代表。

纹饰之外,铜镜并有铭文,曰“张氏作竟(镜)大无伤长保二乐未央八于九升居高堂左龙右虎主四旁朱鸟玄武仙人羊为史宦官至侯王上有辟邪(邪)去不阳从今世昌”,凡54字,笔力刚劲,笔法娴熟,内容则为颂祷吉祥的祝福语,尤其是起首的“张氏作竟(镜)”语,言简意赅指明该镜为张姓工匠所制,故此镜又被称为“张氏作”龙虎纹铜镜。

无独有偶,株洲市博物馆珍藏的这面“张氏作”龙虎纹铜镜并非孤例,考古研究发现表明,全国各地都曾出土过为数不少的类似铜镜,尽管其规制和纹饰风格不一,所纪铭文也各有不同,但文首“张氏作”的字样却一以贯之。这也说明,在东汉时期,张氏家族的一支作为私家铸镜作坊在彼时的社会上已有相当的规模,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汉时民间有“张王李赵遍地刘”之称,张氏排名第一,在现当代张氏也仍然稳居中国姓氏前三甲之列,宗族之盛,在彼时对资金和技术要求都高的铸镜行业分得一杯羹也就毫不奇怪了。

通观全国各地出土的诸多东汉“张氏作”铜镜,大多采高浮雕工艺铸造,纹饰更是繁复

生动,展现了彼时高超的工艺水准,亦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铸镜的张氏家族的行业领军地位。而株洲市博物馆珍藏的这面“张氏作”龙虎纹铜镜,铭文语句如此之完整,没有减字假借,且字字清晰,内容表达直接,言词通俗易懂,吟诵朗朗上口,则更是罕见,特别是集中表达的铸镜作坊拥有这面铜镜的家族后人寄予厚望和期待的铭文内容,祝福他们个个都聪慧睿智、为官步步高升、子孙蕃昌、享乐富贵、长生不老,则更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这种对现实生活赤诚裸露的追求和强烈呼唤也是其他时代铜镜铭文所不及的。

总而言之,这面珍贵的汉镜不仅如实地反映出汉代的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繁荣的文化艺术和人们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仅展示出大汉帝国蓬勃发展的盛世雄风,从另一个层面,也展示着当时张氏家族显赫一时的社会地位和雄厚的财力基础。更重要的是,此镜的“张氏作”铭文,让现代社会被无孔不入的广告不胜其扰的我们明白,原来,早在2000余年前前的东汉时期,广告就已经开始流行。



文物名:“张氏作”龙虎纹铜镜
年代:东汉
材质:青铜
规制:直径12.5厘米,重488克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大英村内废弃的老房子

云阶书院,被遮蔽的历史烟云

段三从

八团大英分水坳是一个位于茶攸交界的小山村。几栋依山而筑的房子,掩映在青翠的树丛中,一座瓦楞青砖被岁月剥蚀得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兀立在蓝天白云下,与周边的民居形成强烈反差。只有那突兀在风雨中的屋檐与飞檐,衬出来的建筑物的形制,依旧显现着一股威严,似乎在诉说它当年的辉煌。走近前去,可以发现,在这个建筑物后面的坡地上,矗立着两根约一米高的方形麻石石柱——人称“桅杆”的“旗杆”石,石柱上刻着“黄昌峻立”四个两寸见方的楷书字。这建筑物就是黄氏祠堂,清代的云阶书院,前清举人黄昌峻就是这所书院的创始人和学教。

然而,在《历代茶陵书院》等介绍茶陵书院历史文化的书籍中,却没有介绍云阶书院,黄昌峻的事迹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下。本着溯本探源的初衷,笔者两次探访大英田,采集《八团乡志》及黄氏族谱中相关的文字材料,结合清代的历史背景作了一些考察,试图还原这所被遗忘的书院及其创始人的种种。

●黄氏族谱里的记录

分水坳这个小山村多数姓黄,黄氏在大英算不上大姓,1993年《八团乡志》载:“(小英)黄氏于乾隆庚寅(1770)章章由江西赣州府长宁县迁居分水坳,现16户,男38人,女35人。”但黄氏在清代却是旺族,正因为该家族在当地办学80余年,学教是从一个贫困人家走出去的学子,被清廷敕封正五品官衔,故名声大噪,曾经引得茶陵、攸县子弟前来求学。

八团乡志《历史人物逸事》有黄昌峻的资料介绍:“黄昌峻,号云阶,八团乡小英村分水坳人,道光元年(1820),幼时颖悟,才思敏捷,读书过目不忘,家贫,受里人赏识,纷纷解囊相助,得遂其志。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江西乡试中举人,会试四次,留京一年,圣恩敕授文林郎,钦加国子监学正五品衔。任江西永宁龙江书院学教一年,赣州长宁石溪书院学教三年,嗣后归里,绝意仕途,官府三召三谢,倾心于桑梓教育事业。因其品学兼优,故茶陵子弟从学者众。光绪二十年(1894)歿,享年七十四岁。”

在黄氏家谱中也有类似记载:“名宗三子世恭,讳昌峻,号云阶,行三,敕授文林郎,钦加国子监学正五品衔。由府廩生同治甲子科(1864)江西乡试中式一百一十二名举人,会试四次,留京一年。品学兼优,茶陵士子从游者甚众。在吉安永宁龙江书院学教一年,又在赣州石溪书院学教一年。”

上面这些貌似简洁的信息,似乎透露出某些玄机:一是湖南人入江西乡试,原因何在?二是“会试四次,留京一年”蕴含的信息量很大,既是黄昌峻与命运的拼搏,又是现实的无奈。三是“绝意仕途,三召三谢”透着古怪:前有四次拼搏,后又隐居不出,服务乡梓教育,原因何在?四是当地人称黄昌峻为“桅杆”的,难道与行船有关?

●江西中举与黄氏家族渊源

谱牒记载,黄昌峻是参加江西乡试中举的。黄昌峻本为茶陵人,何以到江西乡试?

清代举人参加乡试,遵循“分区定额,原籍应试”原则,除非居住地应试,则称为“冒籍”,是违法的。但有一个情况可以例外,这就是“寄籍应试”。据大清法典,考生因其祖父、父亲流落在外地超过20年,且在寄籍地有房产、田产,或已在当地安葬有祖父、父亲的坟墓,以兹证明落籍,考前通过当地官府向上呈明批准,就能在寄籍地应试。黄昌峻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到江西应试。

查黄氏家谱,黄氏系上古传说人物陆终后代。陆终之后有孙南陆公兄弟三人受封于黄,因以国为氏,后为楚所灭,其后裔始南迁,进入楚地。战国时,黄歇(前314年—前238年)为楚相春申君,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唐代之前,歇公后裔辗转迁徙于湖北鄂州(今武昌)、河南柘州、陈州、光州、湖北蕲州、福建的延平、南剑等地。至化公在江西建昌府南丰县(今江西抚州)龙池乡二十七都双井头落足,开宗立派,是为南丰双井黄氏开基祖,也是黄昌峻一支的祖先。

化公后裔各有迁徙,其家族成员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据《黄氏族谱·黄氏源流记》载:“化、井二公之脉棋布星罗,纷纷不一,迁徙靡常,随处有之。盖我化公之裔居于萍乡后迁徙吉安莲花厅及攸县等县,惟我井公之裔徙居麻章,各择其居,处处咨询,居茶城者广,住攸县者多,而且莲花、萍乡亦有居焉。”由此可见,广泛分布于吉安、萍乡、攸县、茶陵者,皆化公、井公二人后裔。大英黄氏裔孙盛章在乾隆庚寅(1770)由江西迁来开基,恰好在乾隆时的江西填湖广时期。旧时,世家望族,人丁繁衍快,而一地资源有限,往往要求子孙离土创业开基,这是一种常态。客家沿山而迁,是典型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1820年黄昌峻出生时,大英黄氏已经迁来五十年。据《八团乡志》记载,至少在黄昌峻中举前,其家境贫寒,当地村民热心助学,“解囊助学”才完成其学业。黄氏在茶陵的家境贫穷,努力平平,但其家族在江西却是世族,在当时应该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因此,黄昌峻寄籍祖地参加应试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会试四次,留京一年”

黄昌峻“会试四次,留京一年”似乎透露出清代举子对科举考试的醉心与执着,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世俗的人生价值观。

黄昌峻家境贫寒,要在京城生活一年,首先涉及的是生存问题。清代的举子在考取举人后,地位上升,但没有实际收益。一般如果功名无望,往往以教书为生。如果没有江西黄氏家族给予他足够的支持,恐怕也难以支撑他在天子脚下的巨额花费。虽然参加会试的考生每年的旅费由朝廷报销,但生活费也是个大花销。

史载,清代名臣曾国藩1834年参加会试落榜,因1836年为太后的六十大寿,朝廷会另加一次考试,叫“恩科”。于是他留京一年参加恩科考试仍落榜后,盘缠耗尽,只好借盘缠回家。黄昌峻留京一年是谱牒所载,当为真事。按清制,每逢丑、辰、未、戌年为会试的时间。他1864年(甲子)中举人,那么他第一次参加会试的时间至早是1865年(同治四年乙丑),之后的会试时间分别是1868(同治七年戊辰)、1871年(同治十年辛未)、1874(同治十三年甲戌),期间没有恩科。至光绪1876年(光绪元年丙子),因光绪登基才有一次恩科,一年后,1877年(光绪二年丁丑)又是正科。

按此推算,如果黄昌峻留京一年是诸如曾国藩那种情形,那应该是1876年到1877年为免除旅途劳顿和往返费时“留京一年”。如果没有参加恩科考试,那么留京一年,又当是另外一种情况。若前一种情况存在,那么黄昌峻在五次正科中应有一次缺考。

●“三召三谢”隐居办学

黄昌峻官授五品,若愿意在朝廷效力,自然不会回乡甘守清贫。清朝官员有候补制,但黄昌峻却只选择了山长(校长)。前有十多年执着科考,后有隐居不出,甚至三召三谢,安于乡梓教育是何故?

黄昌峻选择当山长极有可能是迫于财力匮乏。黄昌峻四次会试,留京一年,所费甚巨。仅舟车费就为数十两之巨,这对农家子弟,确为天文数字。此外,还有雇人付费、食宿,处处费钱。有钱人出门,须有书童,断不让书生孤身上路,或请武师,沿途保镖。京畿之地,天子脚下,其费用更非比乡间。且一连四年往返京城,即便有宗族襄助,也恐难支撑。在此种情形下,迫于口腹之需,黄昌峻不得不收起功名之望,脚踏实地,为生存而奔波于西席之间。

黄昌峻任职的两所书院都在江西,龙江书院和石溪书院都是省内较为有名的书院,龙江书院更为江西四名院之一。在龙江书院历任掌教,确有黄昌峻之名。该院在江西井冈山山市龙市镇,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由原宁冈、鄱县、茶陵三县的客籍绅民捐资修建,据称为当年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因而称“龙江河而得名”。

黄氏自盛章、盛瑞在由江西赣州府长宁县迁居分水坳,家族渐有枝繁叶茂、人丁兴旺之势。而后裔的繁荣给家族带来了诗书传家的可能。开基祖盛章公本身也有一定文名,族谱称其“敕封文林郎”,其子名祖、名宗(黄昌峻的父亲)皆为“例授文林郎”。按古制,帝王自上命下,称为“敕封”,“按例授予”称为“例授”,文林郎相当于正七品的文散官。从这一点看来,自盛章这一代往下,也算是“诗书传家”了。

按儒家的经世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四种境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若不能治国平天下,则以修身齐家为要。因此,黄昌峻退隐办学,当为理智的选择。一则是他虽为“敕授文林郎,钦加国子监学正五品衔”,但文散官终究是个赋闲的官职,与他所追求的“达则兼济天下”相去甚远,因此,退而独善其身,当为明智的选择。二则,家族已隐有发达之势,家庭成员众多,家族遍布茶攸两邑,与其当个龙江书院的山长,名声在外,不如回归家族,掌教家塾,培育后人更利于家族的兴盛。三则黄昌峻少年求学,曾受大英田父老恩惠,服务乡梓,是回报乡情的最好方式。所以,他放弃官教退隐,回乡办学,当为振兴家族、报效地方的一种物极而返的选择。于是,我们不难理解黄昌峻先执教于茶陵,而后安于乡梓教育的原因了。

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黄氏家训。双井黄氏家训有八则:明孝悌以敦人伦;教诗书以光门闾;崇礼仪以序尊卑;别男女以正闺门;尚勤俭以厚衣食;戒游惰以败名业;崇祭祀以报祖德;施恩爱以睦亲族。黄氏八训将“教诗书”放在第二位,可见黄氏把耕读传家中的“读诗书”放在首位。这是客家崇尚儒家价值观的表现。

黄氏家族有隐世的传统。井公在七十大寿时,也曾对后代立下诗训。诗前有序:“大用公之子太安,奉飭南征大功。赞为册马,诏封井公金紫禄大夫,大柱国。”是说其孙儿太安(大用之子)奉皇命南征,大胜利立大功,喜沐皇恩有感而作。诗曰:“书罢吟哦记此篇,我今归隐乐悠然。椿萱堂上难忘墓,桂香阶前竞秀妍。霜鬓尚沾金阙泽,紫衣犹惹御炉烟。苍天不负男儿志,辅佐江山亿万年。”

诗中满是功成身退的悠然、双亲在堂的陶然、兄弟和睦的乐然,当然也有尊崇尊长、垂爱后昆的孝悌精神和一生勤谨、忠君报国的情怀。

尚诗书重教,修人伦齐家,是黄氏家训的中心,它构成黄昌峻一生的行为准则。这种精神与客家人的儒家文化一脉相承,是茶陵地方文化传承中的瑰宝。

最后说说“旗杆”。此旗杆非为塾学之旗杆,实为功名之旗杆。按清制:一、科举考试中考上可以入国子监深造的贡生,或副贡,甚者官方资助的秀才都可以立旗杆,但旗杆上却没有安装“旗斗”;二、乡试中举人者可以立旗杆,旗杆上有一个“旗斗”;三、殿试中进士者可以立两个“旗斗”的旗杆。如果考中状元,家乡就可以立起三斗的旗杆。如果祠堂前立起了四斗旗杆,应是本族子弟中有人受封赐为朝廷一品高官了。立旗杆的目的不是家庭为了炫耀,而是为了鞭策后人仿效。因此,黄昌峻旧居路边上的麻石柱应该是“功名旗杆”。

总之,黄昌峻及云阶书院是藏在深山里的客家文化的瑰宝,是庐陵文化对茶乡地方书院文化浸润濡染的产物,代表了茶乡耕读文化的传承,值得大英村和茶乡人好好挖掘实地,为生存而奔波于西席之间。